

经济哲学视域下劳动观念的嬗变及现代性反思

——基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总结

王 程*

【摘 要】 在经济哲学视域下,劳动观念的变迁不仅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发育的特殊轨迹,更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劳动观念进行经济哲学追问,可以为我们研判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人性伦理观念变革趋势提供积极的理论参考坐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表明,劳动观念的嬗变主要体现为三个向度:一是劳动范畴外延扩大、内涵加深;二是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建立,使劳动伦理呈现复杂的形态;三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成为劳动观念的核心价值。

【关键词】 劳动观念;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哲学;现代性反思

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亦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向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社会全面转型,劳动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在分工形式、空间范围、工作行为、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发生着剧变。对劳动观念进行经济哲学追问,可以为我们研判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人性伦理观念变革趋势提供积极的理论参考坐标。当前,站在新时代的起点重新反思劳动观念,可以发现无数劳动者的实践行为,是改革开放走向成功和再度启航的根本动力。观念的变化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展现出自己新的历史形态,如果把过去——当下——未来的线性时间归纳到劳动范畴的共时性判断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的发展与创新依据就得以显现:历史并非被“我思故我在”的观念所构建,而是人的当下社会活动铸成了观念生成的根基,主导着观念演进的范式,因此,“我劳动故历史在”才是真实的历史演化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劳动观念嬗变过程,恰是一本反映真实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相册。

一、作为现代范畴的劳动观念阐释

本文所要探讨的“劳动观念”,是指现代性社会所生成的特定范畴,它被马克思称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①。实际上,古典经济学较早地关注到劳动是现代性社会的基始性力量,亚当·斯密关于劳

*法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233030。本文是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项目“金融全球化境遇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与构建路径研究”(GXYQ2018018)、上海市改革开放40周年研究系列项目“现代性发育的13个观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哲学反思”(2017BHA001)阶段性成果。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动——分工——专业化——现代社会生成的论点以经典的形式在经济学文献中经久不衰；亚当·斯密初步阐述了现代社会为什么存在劳动分工以及劳动分工对社会中知识形成的作用^①；而新古典经济学则认为，劳动分工与知识的形成之间存在协同演化（co-evolution），知识内生性影响经济增长，分工促进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它有助于提高技能，增长专业知识的积累，通过这种积累，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同时促进了市场的良性扩张，进而激发新一轮劳动分工。大卫·李嘉图时代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通过科学劳动的规定把一切领域的劳动通约为必要劳动时间，这赋予了作为现代范畴的劳动两个决定性意义：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注入，使劳动范畴具备了主观效用的因素，为边际革命奠定了基础；二是科学抽象方法的运用，使生产劳动进一步客观一体化为大机器时代最重要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以这种生产关系为新的基点考察社会历史进程，促使经济学从关注财富积累转向关注资本积累。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对于后世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黑格尔和马克思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尤其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将现代范畴的劳动作为构筑理论大厦的基石。当然，目前所流行的主流经济学，也正是在对古典经济学体系作断章取义的理解基础上完成的。譬如，杰文斯把劳动定义为：“心或身所忍受的任何含有痛苦的努力，而以未来利益为全部目的或一部分目的者。”^②马歇尔则更为功利化地认为劳动“不是为了直接从工作之中取得欢乐，而完全或部分地是为了某种良好的目的而进行的脑力或体力支出。”^③可见，以效率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仅从资源配置的供给与产出层面片面地理解了古典经济学的要义，将劳动定义为一种纯粹获取利益的手段，丧失了其作为感性的人的存在方式与现代社会生成本体论依据的哲学向度，马克思对这种方法论进行过严厉地批判，在此基础上拓殖出了全新的理论体系。

首先，马克思把古典经济学对直观的劳动样态研究发展为具有强大历史感的劳动史观。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的新派别。”^④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化，是人追求自由定在的根本活动，因此，劳动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利益交换关系，而是在人创造物、交换物中所生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曾一度被康德抽象为“物自体”，被黑格尔神秘化为“绝对精神”，而马克思则从劳动范畴中发现了人对自然、人与人的对象化关系以及以此构建出的历史性的社会生活世界。可见，恩格斯的评论凝练地概括出了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其次，马克思从劳动范畴出发，把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仅仅作“中介”地位的劳动，发展为以劳动为核心范畴的理论体系，找到了“主观意识转变为客观物质力量的机制。”^⑤因此，劳动范畴的核心地位是马克思在对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继承批判基础上的重大发现，也是马克思超越德国古典哲学，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一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的就是以劳动为核心的处在具体生产关系中的人从经济生活到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从而创造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无产阶级解放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以实践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可见，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三大学科的划分，实际上是具有内在关联的整体，其核心程式正是马克思对劳动范畴的全新理解。最后，通过对劳动范畴内部矛盾的揭示，发现了人类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生成了相互依赖的本质关系，无论是对劳动的二重性、价值的二重性、交换的二重性等诸多关系矛盾运动的阐释，都深刻地体现出由特殊向一般转化的辩证法思维，这些关系在社会发展的动力维度被抽象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人类社会形态更迭的历史

① [法] 马库斯·C·贝克尔：《劳动分工与知识分工：企业演化理论的因果关系》，[德] 乌韦·坎特纳，[意] 弗朗哥·马雷尔巴尔主编：《创新、产业动态与结构变迁》，肖兴志 郭晓丹 郑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3页。

② [英]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3页。

③ [英]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⑤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第99页。

趋势中表现为人类社会三形态的演进过程,这种过程完整地彰显出人类社会在不断转化与扬弃矛盾中走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逻辑甬道里。

对改革开放40年来劳动观念的研究,必须以现代意义上的劳动范畴为起点,把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作为研究的具体语境,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作为指导,从中发现具有中国特殊性意义和世界历史普遍性规律的劳动观念变迁过程。

二、改革开放推动劳动观念发生质变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孕育,广大劳动者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走出了一条兴旺发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党和国家政策的全面进步,劳动关系由行政隶属型向市场契约化转型,劳动观念也发生着历史性变迁,劳动范畴的外延扩大,内涵加深。

其一,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化,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系列观念的束缚被打破,劳动观念的破冰从探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问题开始。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①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片面地理解了这句话,理论研究只注重简单劳动的重要性。实际上,马克思所运用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深入,这句话并非将两种劳动只做量的对比,而是为了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劳动价值论所运用的研究手法,质言之,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通约只能在抽象劳动层面进行,但是在具体层面,两者具有相对性的特征,需要辩证加以理解。由于生产力水平处于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两种劳动始终处于历史性状态,原先的复杂劳动可能会因为科技水平的提高成为简单劳动,一个时代的复杂劳动可能成为另一个时代的简单劳动,可见,许多作为结果的简单劳动背后,体现的是复杂劳动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代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阶段性特征。因此,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复杂劳动会不断向简单劳动转化,而简单劳动的内涵也会不断加深。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对市场交换实践的反思,人们认识到,在处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关系时,应格外注重知识进步、科技成果的转化等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均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推动,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通过市场经济的中介作用,推动复杂劳动不断向更有内涵的简单劳动转化,才更能体现出现代市场环境下劳动的技术性、交换的普遍性和社会主义劳动的进步性。

其二,重新看待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改革开放以前,非生产性劳动被认为具有资本主义属性,带有天然的剥削性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观点已经不能体现历史进步趋势。于光远先生撰文指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其他就不是,而且把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又狭窄地理解为直接处理劳动对象的劳动。这种在解放初期从苏联那里学来的这个理论,加上我国有一些人在处理实际问题上的错误见解,在实践上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按照这种理论,我国商业和服务业、我国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理所当然地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些部门中从事劳动的人,理所当然地不能被承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②对非生产性劳动地位的肯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撑,一方面,市场经济下重要的经济活动因素——第三产业具有了合法的社会地位,它们不再是“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而是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中最有活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非生产性劳动使劳动者的范围有了充分的延展,劳动者不仅局限于工人和农民,而是覆盖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为了个人生活而劳作的小生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②于光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1期。

产者、商人也具有了劳动者地位。这事实上体现了国家治理进程中激励机制的转型与建构。^①

其三,对精神劳动的肯定,标志着广大知识分子地位的确认。改革开放以前,广大知识分子的地位显得十分尴尬,知识分子的精神劳动也被定位为一种具有剥削属性的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知识分子被确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蒋学模先生曾指出:“精神产品就是科学、艺术、文学、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观念形态的产品、而精神生产和精神劳动就是以创造精神产品为目的的生产和劳动。它是一种创新的生产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同等重要,呈现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同促进的关系。^②20世纪80年代以后,知识经济的全面来临使精神劳动逐渐成为主导物质生产的内生驱动力,“即使物质劳动对整个社会生活还具有基础性作用,然而它的决定性作用正被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精神劳动所取代。”^③精神劳动地位的肯定对改革开放的推进有两点重大的意义,一是直接促进了科学技术在国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将之总结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二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地位最终得以肯定,社会对教育与科研工作者的劳动有了正确的认识,肯定了他们的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塑造人类美好心灵的活动,广大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改革开放前期关于劳动范畴的探索,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带来了思想解放与思想启蒙,这些探索有力地突破了原有的界线,使劳动范畴从抽象的集体劳动观念逐步走到了体现个人价值的现实层面,劳动观念的变化折射出劳动形式已经从单一的劳动转化为多元化的劳动,经济运行模式开始走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结构。然而,由于劳动范畴的打开,实践生活的不断丰富,观念层面的冲突也开始呈现。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引发了关于雇佣几个工人才算资本家的讨论,这则消息背后实际隐藏着诸多令人深思的难题,劳动观念层面呈现出两个维度的张力。其一,雇佣劳动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力成为商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蓬勃发展,市场经济的运行使越来越多的“承包鱼塘问题”涌现,“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④,问题倒逼着人们加以反思和变革。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思想的交锋,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产品仍然以商品的形式存在,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必须以货币形式加以报酬,这就形成相对等量劳动的交换,劳动力成为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客观存在,是当下历史前进过程中的必然。随着这一问题的破冰,雇工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水平多层次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必然存在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也需要广大劳动者通过有利益回报的劳动加以驱动。其二,个人劳动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每个劳动者的现实利益为驱动,鼓励个体价值的发育,在改革大潮中,个体劳动开始受到重视,劳动者对自身劳动价值的重新认知,成为其取得社会价值的基础,个体劳动成为个人获取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来源,因此,每个人的个性也开始蓬勃发展,财富的扩张使人的个性找到了现实中的定在,但是,由于主体性意识的不断膨胀,人们开始忽略社会秩序的意义,个人侵害集体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同时,知识分子的劳动地位虽然受到了肯定,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大量侵害版权的行为开始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最后,多元化的劳动形式,带来了农村和城市的贫富差距,城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力推动下不断崛起,农村依然固守着小农经济的劳动观念,城乡之间的观念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特有的时代标签。^⑤

①成婧:《国家治理进程中激励机制的转型与建构》,《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②蒋学模:《论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精神劳动和精神产品》,《学术月刊》1984年第1期。

③袁杰:《论唯物史观语境中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地位》,《哲学研究》2016年第2期。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

⑤王春城:《重新解读公共政策本质——从社会意志与国家意志组合关系的视角出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使劳动观念不断成熟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劳动形式发生了诸多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人性解放与资本解放,不断解构着中国几千年的落后的劳动形式。劳动产权之间的自由交换,已成为中国现代性社会的重要特征,雇佣劳动关系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经济联系,“劳动关系从国家化、行政化向企业化、契约化加速推进,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和法治化”^①,劳动观念也在中国现代性发育中不断走向成熟。

其一,劳动主体范围的扩大,劳动阶级属性得到最大化地延展,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被彻底激活,“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②,也为劳动主体范围的打开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据统计,1991年,全国个体工商户1417万户,从业人员2258万人;私营企业10.78万户,从业人员184万人;外商投资企业3.72万户,从业人员165万人^③。广大私营企业主、合资企业主、个体经营户等原先被排斥在无产阶级以外的劳动者,在身份上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党的劳动主体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及时化解了诸多阻力,凡是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劳动者都获得了平等的劳动地位,都能享受平等的劳动权利和政治地位。

其二,各类劳动成果受到普遍尊重,“劳动者光荣”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首先,知识分子的精神劳动产品受到重视与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知识分子的劳动样态、劳动成果越来越具体地展现在社会面前,人们认识到,精神劳作是一项艰难而系统的工作,精神产品不但具有现实的使用价值,而且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更具推动作用,2005年成立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标志着我国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进行考量。其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重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层次复杂,劳动关系的特征从原有的长期性、单一性、依附性转变为短暂性、复杂性和独立性,劳动者的权益既不再受“单位”的制约,同时也丧失了“单位”的保护,这一时期,国家连续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为完善我国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有研究表明:“《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度达23%,提高了农民工拥有各项社会保险的比例为10%—26%。”^④最后,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改革不断加大。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被打破,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共存,广大劳动者可以根据个人利益选择分配形式,分配方式不再是由单向度的命令或指令构成,而是雇佣关系双方协商的结果。

其三,劳动成为一种国际化理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劳动国际化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观念,首先,劳动产权的交换不仅成为国内普遍的经济活动,更成为一种国际化行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受到国际认可,劳动产品成为中国形象的标志,大量带有中国特色、中国元素的产品,在世界上塑造了全新的中国形象,尤其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出口,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的物资匮乏难题;其次,国际务工交流频繁,大量劳动者开始选择出国谋取职业。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观念相比,劳动者不再对外国务工环境加以敌视,国家也开始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劳动者外出务工。在外务工劳动人员中,既有层次较低的纯体力劳动者,还包括广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现在看来,当时的大规模国际劳务输出,为我国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固有的藩篱不断被打破,中国已经成为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与此同时,现代性症候也暴露在社会面前,尤其是劳动环境、生存环境和劳动伦理等问题备受挑战。

① 宋士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0页。

③ 参见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No.3 (200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12、32、43页。

④ 杜鹏程等:《劳动保护与农民工福利改善——基于新〈劳动合同法〉的视角》,《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其一,劳动量的飙升带来了GDP的飞速发展,但在质上却呈现出粗放型、复制化的缺陷。首先,GDP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牺牲广大劳动者利益所换取的,尤其是数亿农民工群体的体力劳动,从劳动量的积累上推动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但大部分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力十分低廉,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次,资本逻辑的展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伴随着高消耗、高污染的代价推进,国民劳动资源透支使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造成自然伦理不断弱化,劳动者的生存环境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与此同时,由于劳动者的消费动力不足,透支资源的增长模式已经危机到国家长远发展;最后,粗放型的劳动还表现在简单的产品的复制层面,一方面,大量私营企业的兴起,充分活跃了市场经济,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但大部分生产都是简单模仿型的复制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创新精神受到制约,“假冒伪劣”产品成为时代词语;另一方面,虽然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但是高质量的精神产品生产依然匮乏,盗版光碟、盗版软件层出不穷。经济发展在高增长的同时遭遇了严重的瓶颈。

其二,劳动伦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所谓劳动伦理,是指“在劳动关系领域以劳动关系双方内心信念为基础的、调整劳动关系双方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它既是一个经济范畴,更是哲学范畴,主要关注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内在需求和劳动道德观念。改革开放以后,各类资本在中国迅速发展壮大,资本逻辑的普适性在中国有了特殊的表现,改革开放带来了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但强大的文化基因使劳动者在习俗上还处在巨大的历史轮盘的惯性之下,新一代城市劳动者还未剪断“人对人的依赖”的脐带,就被卷入“人对物的依赖”市场经济体系中。世俗主义、价值通约主义、经济个人主义与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形态相互冲突,导致伦理观念十分复杂。首先,弱势群体成为特定劳动者的代名词,这折射出劳动分配差距过大,劳动者在分配领域还不能受到公正对待的社会现实;其次,“过劳死”现象的出现,反映了雇佣者对劳动力的过度使用,忽视劳动者休息、疗养等一系列权利的后果;再次,各种劳动心理障碍层出不穷,表明社会对劳动者心理健康、情感关怀的漠视;最后,各类劳动纠纷现象普遍发生,比如,国家编制内人员辞职问题、劳动保险与劳动合同效力问题、劳动者兼职问题等一系列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得以暴露,深度考验着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

上述问题可以集中概括为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党中央及时地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将劳动者的人格尊严、经济利益、身心健康、工作生活环境、代际公平和情感关怀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加以确立,成为劳动观念的再一次飞跃。

四、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地位的新时代劳动观念

历史从根本上说是劳动者自己的事业,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①这段话意味深长地表明,新时代条件下的劳动观念,其核心价值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全体劳动者的福祉。

其一,共享理念的生成,使劳动者能够更为公平地分享自己的成果,劳动人民的获得感成为判断新时代劳动价值的标准。首先,劳动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不但创造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创造着新的社会关系,因此,“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须要具体化和实践化。”^①可见,实现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发展,使劳动者共享劳动成果,才是展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根本标志。改革开放40年来,劳动者最根本的利益——生存权、发展权得到了维护,广大劳动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真正成为现实的美好生活,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全体劳动者正确的选择。其次,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使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从理念转化为现实。德国社会学家希尔德布兰德曾以交换方式的不同把社会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信用经济”^②,而共享经济就是基于信用基础上,把物的当前价值与未来价值通过共享信息,实现对物的使用权的共享与再分配。借助互联网技术和金融网络的普及,共享消费已延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共享单车到共享办公、共享服饰、共享租车,共享模式迅速成为新时代中国的一种普遍和基本的消费模式。这种模式的积极意义在于,劳动者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界线,实现劳动成果的多次使用,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质的提升,极大地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质量。

其二,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劳动伦理得到重点加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成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伦理观念。首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使劳动形式,消费行为等一系列经济活动都有了重大的转变。一是在劳动的对象方面,赋予自然以道德关怀,把人的伦理与自然伦理统一考量,在处理当下利益与未来发展、环境保护等张力问题时,能够主动放弃短期利益,为未来的劳动提供长远保障,这成为新时代劳动观念的重大历史进步。二是工匠精神的弘扬,不但体现出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改善,更反映了劳动者人文素养和精神品质的提升,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后发优势。其次,劳动者的情感关怀成为社会共识。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生代劳动者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使劳动方式、表达形式、处理问题的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劳动者素质的提升、精神生活的关怀、城市治理的进步、城市高效率地运转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有机的整体,尤其是在义务与责任、契约与奉献、个体与整体、诚信与人本、公平与效率等方面,更加强调相互耦合。最后,劳动伦理更为注重劳动的发展与中国传统精神的注入。劳动观念的演化,离不开家族相似的历史观念溯源,观念的更新更是历史性与共时性的坐标叠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创新发展,给劳动观念注入了新的正能量。

其三,各类劳动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劳动者地位和权益走在了被法所确认的属性中,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不可侵犯,产权受法律保护成为新时代重要的劳动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法治的基础是维护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进入新时代以后,依法治国理念的全面推行,人民在依法劳动、依法享有劳动成果方面有了重大的历史进步,尤其是《物权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劳动成为被法确立和保障的对象。法治之于劳动者的关系已非可有可无的外部联系,而是处于本质地位的内生属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成为有机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的同构,体现出党的领导、劳动者创造财富共享财富、人民当家作主三者相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其四,涉外劳动观念更为宏观与理性。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涉外劳动观念也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变得更为宏观和理性。首先,从国家层面分析,“一带一路”,亚洲投资银行等一系列战略的施行,促使中国劳动者的贡献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助推作用。新时代的涉外劳动观念,更加彰显了合作共赢的先进理念,中国不断地将本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劳动技术、劳动产品输出到国外,不但帮助广大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而且广泛参与到发达国家核心产业合作与竞争中。与此同时,中国的“和合”观念也广播到了世界各地,中国精神的独特优势受到国际社会一致认可。其次,以个人为单位的外出劳动更为理性,进入新时代后,单纯体力劳动的务工者已经不是外出劳务的主要群体,“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是产生世界级科

^①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27页。

^②陈岱孙主编:《政治经济学史》(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3页。

技大师、领军人才、尖子人才的重要基础。”^①

进入新时代以后,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劳动观念的演化趋势也逐渐清晰:其一,把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放在首要位置。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增强,涉外劳动纠纷日益频繁。近期美国再次挥舞贸易制裁的大棒,对中国经济进行制裁,这个严重的问题背后表明,中国的崛起并非西方所情愿接受的事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把中国定义在资源掠夺与产品倾销的概念中,中国产品的广泛输出,让美国倍感“疼痛”,贸易保护主义再度盛行,中国劳动者和劳动产品在知识产权、利益分配、法律保护等方面仍没受到国际社会公平公正的对待,国家应从宏观层面制定有利于中国劳动者的政策与法规,加强劳动者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与自我防范的安全意识教育,在国际竞争中坚定地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劳动者的正当权益,瓦解西方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对我国劳动者的歧视与伤害,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理念。其二,加大对弱势劳动群体的权益保护与利益分配的倾斜。如今,大量建国初期的劳动者已经步入晚年,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新时代的伟大成就离不开他们当年抛家舍业、艰苦奋斗的辛勤劳作,他们奠定了新中国的成长根基,但是,这些劳动者已经没有市场竞争的能力,很多人的生活还不富裕甚至比较拮据,国家应当通过有目的的顶层设计和社会调节,使这些劳动者享受到便捷、安全和持久的社会养老、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全社会也应当树立对离退休劳动者生活、情感关怀的价值理念,使每一代劳动者都能在晚年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新时代的重要目标是彻底解决困扰中国几千年的贫困问题,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是边远的山区和边疆地区,那里不但有生活贫困的群众,更有祖国未成年的下一代,当地教师、知识分子为了教育祖国的下一代,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领取着微薄的报酬,国家应当通过制度层面的调节,大幅增加这部分劳动者的收入,给予他们相应的政治待遇和社会保障,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

(责任编辑:杨嵘均)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and Modernity of the Idea of 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Philosophy: An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Practice during the 40 Years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NG Che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philosophy, the change of the idea of labor not only reflects the special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in China, but also reveals the strength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labor can provide us with an effective frame of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nd the tendency for change in the ideas of human nature and ethics in China. Practice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China's incep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shown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labor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First,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has been enlarged and its intension deepened. Second, establishment of market-oriented relations of labor renders ethics concerning labor more complex. Third, since the arrival of the new era, ensuring people the principal position has become part of the core values of the idea of labor.

Keywords: idea of lab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syste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economic philosophy;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75页。